

荀子新论

方尔加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荀子新论

方尔加 著

(京) 新登字086号

荀子新论

方尔加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5.5印张 11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37—958—2/B·5 定价: 5.00元

谨以此书敬献为中华民族进
入现代文明而英勇献身的谭嗣同
烈士！

自序

一九八七年，当我完成博士论文《王阳明心学研究》（已于一九八九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遂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孔子和孟子。我是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心态去研究孔孟的。我很想挖一挖阻碍中华民族发展，戕害中国人民的封建礼教的老根。我开始仔细研读《论语》、《孟子》。可是，愈研读愈发感到，孔孟的思想与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并非一回事。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允许不允许个人有信仰。封建礼教不讲求个人的信仰，唯以服从尊卑上下的人伦为天职。如臣子于君，无论君贤否，臣子都要奉君主为天下第一大圣人。依此类推，儿子于父亲，妻子于丈夫亦莫不如此。没有信仰，就没有是非观念。朱熹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祐。”（《戊申延和奏礼一》）没有信仰和是非观念，也就没有自律，没有自律就没有道德。所以，充满道德词汇的礼教其实是非道德的。

与封建礼教相反，孔孟则十分强调个人内心的信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孔子反对“去告朔之饩羊”，非因其为祖宗留下的礼，纯系发自个人内心之“爱”，这一爱的情感是个人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仁”的含义是“爱人”。孔子教导弟子做事要出自“仁”，也是强调个人的信

仰。当时的社会，不讲信仰，行礼徒取形表，流行为俗，孔子愤然质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对信仰的强调使孔子真真能够好善恶恶，以道论事而非以等级论事。对君主，孔子从不盲目服从。“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季康子想用杀戮安定社会，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同上）鲁哀公问孔子的高足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回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上）观孔孟一生，与君主龃龉不断。那么君与臣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按孔孟观点，应是以道相求的关系。这个道在君臣之间具体体现为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鲁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回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固然要忠君，君也要以“礼”待臣。如果君主不尽此义务怎么办？孟子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与君主论事，常危言厉色，毫无媚意。这些与后世一味尊君媚上，奴味十足的礼教毫无共同之处。

不能否认，封建礼教确实与孔孟有一定的关系，这就像人与猿的关系一样。人与猿有质的不同，但人却是从猿发展而来。但是，把儒家思想导向礼教轨道的却不是孔孟。从猿到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但其中必有一个质变的关节点。同样，由孔孟儒学发展到异质的礼教，其间亦必然有一个质变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在谁身上呢？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使我无法安心研究孔孟，以至不得不中断

研究去寻找这个人。我一面从孔孟开始一步步向后寻踪，一面从宋明理学一步步向前溯源，翻阅大量儒学资料，经过反复比较分析，最后终于确认，荀子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节点。荀子对孔子的思想做了很多改造，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尊君。梁启超概括荀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尊君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在荀子之前，孔子、颜回、有若、曾参、子夏、子思、孟子，没有哪一个儒者像荀子那样把尊君问题突出出来。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荀子·致士》）在至高无上的君主面前，臣的表现如何呢？荀子虽没鼓吹盲目顺从，但却提出了一个埋下隐患的前提，即：利君与不利君。他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荀子·臣道》）可见，无论顺命还是逆命，利君则为良臣，害君则为贼子。君主圣明如此，君主昏暴亦如此。他说：“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诤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同上）他把贵君列为儒者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荀子·儒效》）孔孟未尝不讲忠君，但前提是君主必须有道。臣子忠君完全出自对道的信仰。若君主无道，臣自不必忠，甚至可以发动革命“诛一夫纣”。荀子则不然，臣子于君“利”字为大，“道”字未及。这一变化真真使荀子变成孔孟的罪人。从此，儒学开始从追求信仰的道德自律蜕变为没有信仰的非道。

德他律；从爱人利人的人本哲学蜕变为媚君利君的奴才哲学。可以说，误国误民的封建礼教不是孔孟之儒而是荀儒。这不单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前人早有此论。异端思想家戴震指出：“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宋儒之说，……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荀子之所谓性，即宋儒之所谓气质。”（《孟子字义疏证·绪言》）维新志士谭嗣同指出：“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梁启超也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遗憾的是前人这些精辟之论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不少人总是把孔孟学说当做封建礼教的始作俑者，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孔孟学说中一些积极因素的阐扬；对荀学的研究也就自然难于深入甚至文不对题。想到这些，笔者遂产生一种研究荀子的责任感。

本书系笔者深受戴震、谭嗣同、梁启超启发，参照今日学术界研究成果并结合个人感受，经数年积累而成，观点未必正确，唯求收引玉之功。

作 者

1993年元月

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荀子的生平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	1
第一节	荀子的生平	1
第二节	荀子生活的时代背景	3
第三节	儒家复兴的功史条件	8
第二章	荀子思想探源	29
第一节	荀子对儒家的继承	29
第二节	其他各家对荀子的影响	36
第三章	论荀子思想（上）	42
	——荀子对儒家思想的改造。	
第一节	为王者尊	43
第二节	务实精神	55
第四章	论荀子思想（下）	71
	——对荀子几个思想的剖析	
第一节	论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	71
第二节	论荀子的礼	106
第五章	对后人评价荀子的点评	158

第一章

荀子的生平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荀子的生平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他的思想，有《荀子》一书可资研究，可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古籍的记载十分简略，且又相互矛盾；历来的考证文字虽然不少，但说法也有不同。现只能据其记载，择其可从者，粗略作些推考。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生年不详。据《史记·孟荀列传》说，荀子曾在齐国稷下讲学，刘向《孙卿子叙》记载：“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按，齐襄王死于公元前 265 年，如果在齐襄王晚年荀子六十岁左右，则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 325 年前后。少年时代的荀子聪慧颖悟。后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齐国）游学。”公元前 319 年（齐宣王元年），齐国稷下学宫复盛。齐国从威王初年（公元前 357 年）设立稷下学宫，到齐宣王时，再次兴盛。淳于髡、田骈、慎到、环渊等在稷下讲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荀子来稷下游学，通过听各家各派的学者们讲

学，而直接掌握了他们的学说思想，为以后的继承与批判打下了坚实基础。据夏甄陶先生考证，荀子曾直接师事过宋钐（夏甄陶《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荀子在稷下游学，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公元前 285 年（齐湣王三十六年）前后，才离开齐国，到了楚国。桓宽《盐铁论·论儒》讲了荀子别齐适楚的原因。“……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荀卿适楚。”公元前 279 年（齐襄王五年），齐国即墨守将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替乐毅的机会，向燕国军队发动大规模反攻，一举收复失地七十多城，“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史记·乐毅列传》）。齐襄王入临淄后，又招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荀子这时又回到齐国。由于田骈等老一辈学者都已经死去，荀子在学宫里“最为老师，”一直到他最后离开齐国，曾经“三为祭酒。”（见《史记·孟荀列传》）公元前 266 年（齐襄王十八年，秦昭王四十一年），秦昭王起用范雎为相，并封为应侯。这以后，荀子曾应聘到秦国进行考察。荀子入秦的确切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 264 年左右，因为这时齐襄王去，而荀子是很受齐襄王尊宠的。秦国便利用这个机会聘荀入秦。

荀子在秦国从政治、军事、民情习俗以及自然形势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并表示了赞扬和钦佩，流露出他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他提出了“力术止，义术行，”用“王道”统一中国的主张，建议秦国任用“儒

者”，因而同当时秦国推行的以“霸道”为主的法家路线有所牴牾，故未见用于秦国，只得返回齐国。

荀子自秦返齐后，正值齐王建在位，但政权却由齐襄王后控制，荀子称这是“女主乱之官，”劝说齐相积极参与国政。荀子因此而遭到谗言攻击，乃于公元前255年（齐王建十年，楚考烈王八年）到楚国，受春申君的委任作兰陵令。荀子在楚国又遭到谗言攻击，于是又到赵国。在赵国曾与楚将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荀子·议兵》载有荀子学生陈嚣、李斯同他的问答，可知荀子到赵国有陈嚣、李斯同行，议兵时他们也在场，《议兵》篇可能就是由他们记录整理而成的。《史记·李斯传》载：李斯“欲西入秦，辞于孙卿，……至秦，会庄襄王卒。”荀子在赵国，又为春申君所固请，乃复返楚国，继续作兰陵令。一直到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荀子才废居兰陵。此时他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关于荀子卒年已无可考，《史记》本传只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居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关于《荀子》一书，初经刘向整理校定，名《孙卿新书》，凡三十二篇。唐代中叶杨倞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对各篇次序也重新编排，并作《荀子注》。清代王先谦作《荀子集解》。今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以王氏《集解》为底本，并吸取前人和现代人的研究成果，作《荀子新注》。本书所引荀子语均出于该书。

第二节 荀子生活的时代背景

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制度的性

质，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对中华大地行将实现统一这一点没有异议。统一二字可作为那个时代背景的集中概括。

统一最突出地体现在强国的兼并战争上，尤其是秦国的兼并战争。荀子将二十岁时，秦昭王即位（前306年），秦国对关东诸侯的攻势越来越凌厉，越来越不可阻挡。可以说，自秦昭王起，秦国实际已开始进行统一中华大地的战争。公元前293年（荀子三十二岁）伊阙之战，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9年（荀子四十六岁）郢之战，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公元前273年（荀子五十二岁）华阳之战，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荀子六十五岁）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主力四十五万。其他较小规模的战争不计，只就白起指挥的这四次大战，秦所歼灭三晋和楚国的士兵已在百万以上，同时兼并了大片土地。它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战斗力，奠定了以后秦国取得统一中华战争胜利的基础。公元前249年（荀子七十六岁），秦庄襄王继位后，任用吕不韦为相国，继续进行兼并战争。秦先灭建都于巩的东周，摘掉这顶遮在诸侯头上的破草帽，同时出兵攻韩，取得韩的成皋、荥阳，连同原先的西周和东周故土，合成三川郡；公元前244年（荀子八十一岁），秦又攻取了韩十三城以及魏的埽、有诡，两年后又分南北两路攻取了魏的酸、燕、虚、桃人、山阳和雍丘、长平等十二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前此所兼并的卫地，把所得成皋以东土地连同卫的旧都濮阳建置为东郡。秦自从建立了东郡，国土就和齐境相接，截断了“山东从亲之腰，”并对韩魏两国国都形成三面包围的形势。从此，诸侯将灭于秦的形势已非常明显，荀子死后不到二十年，秦王

政终于统一了中国。

统一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战国后期，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个地区在经济上彼此间的联系和依赖已相当密切。身居秦国的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提到的各地输入秦国的贵重特产，有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犀象之器、太阿之剑、纤离之马、骏骖騄、翠凤之旗、灵鼉之鼓、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傅玕之珥、阿缟之饰等。《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了各地美食。美味的鱼有洞庭之鱖、东海之鲈；美味的蔬菜有华阳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美味的水果有江南之橘、云梦之柚等。居住在东方齐国的荀子也描绘了中华各地经济联系的密切：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紵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荀子·王制》以下同书只注篇名）总之，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和分工，使华夏各地连成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

各地的经济联系不但体现在分工和交换上，还体现在对水利的治理与利用上。水利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命脉。战国时代，各大国割据称雄，对于水利的治理，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例如：齐和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地势高，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常泛滥，因而齐国在沿黄河二十五

里处筑了堤防，从此河水泛滥，“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在黄河两岸五十里间，河水时来时去。有时好久没有水灾，农民也就逐渐建筑房屋，聚成村落，忽而大水来时又遭漂没。

（见《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各国筑堤，只顾自己的利益，遇到天旱，就争夺水利，妨碍别国的农业生产。例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东周策）一遇大水，就“以邻为壑。”另外，在激烈的战争中，有的国家往往不顾人民死活，决堤放水，用来对付敌国。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就曾决黄河水灌长垣。

（《水经注》引《竹书纪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灭魏国时，包围了魏都大梁，也曾引黄河大沟的水来灌大梁，大梁城浸水三个月，城墙坍坏，魏君不得不降。赵国在对外作战中曾于公元前332年，281年、278年、272年数次决黄河、引漳河，使黄河、漳水各三度为灾。因而，出于统一管理水利、防治水旱灾害的需要，人民也迫切要求统一。

统一的好处已显而易见，分裂的灾难令人苦不堪言。尤其是分裂所带来的战争，使广大人民遭受了被杀害、被掠夺和破产流亡的深重苦难。有人作过统计，经历一场大战，人民和国家所遭受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据说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战争所带来的灾害唯有靠统一才能铲除，所以统一乃是必然趋势。

统一的趋势不仅客观存在，也被广大有识之士意识到。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王霸》）荀子看到，当时人的权力欲已不满足于做一国之君，治一方之民，而是想当整个天下的主人，使天下人听命于己。这个野心兼透露出当时的统治者大都有统一天下的意念。惠施“历物”十事之末，“泛爱万物，天下一体也。”明确将天下视为一体。邹衍地理学超越一方一地的视野，将整个中华大地视为赤县神州。《吕氏春秋》亦感慨：“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又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篇》。《观世篇》略同）总之，天下应该统一，天下一定统一，这已是不必言说的定论。

政治、经济的统一趋向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反映。思想上的“兼并”战争也在进行。由春秋时代开始出现的百家争鸣发展到战国后期，出现了总结、合流的趋势。《管子》书的自然观将唯物主义的“精气”说与老子神秘的“道”相揉和；其政治思想将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相揉和；慎到将法与老子的道相揉和；韩非一面宣传法家思想，一面解老、喻老，吸收道家思想。《庄子·天下篇》企图对先秦各派思想的发展作一个有系统的，他自认为是客观的叙述和评价。篇中从道家的角度阐述了各派的中心思想、活动情况，并列举了重要的代表人物。当时最著名的折衷、调和学派是后人所称的杂家。《汉书·艺文志》形容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吕氏春

秋》提出了著名的折衷主义理论。其中说：“凡生，非一气之化也；长，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众正之所积，其福无不及也；众邪之所积，其祸无不逮也。”

（《明理》）这是说，一个东西的发育和成长，是许多积极因素聚集在一起的结果。它又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用众》）这是说，要想占据整个天下，必须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同上）后面将提到，荀子的思想也是在诸子的批判总结中产生的，是诸子合流的产物。

第三节 儒家复兴的历史条件

荀子属于儒家，偏重“齐之以礼。”他说：“在人者莫明于礼义。”（《天论》）“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他尊孔子为“大儒”，称孔子这样的“大儒”“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儒效》）但是，在荀子以前，儒家的境况一直不太景气，自荀子以后，儒家虽没有马上受到官方重视，但复兴的潜流已开始出现。这股潜流到汉代前期越来越发展、扩大，到了汉武帝时，终于形成为冲击其他学派的浪潮。那么，儒家复兴的潜流是在何种条件下形成的呢？

一、荀子以前为统治者所重视的思想及其局限

荀子可视为先秦第三个大儒。前两个是孔子和孟子。孔子和孟子虽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他们的政治主张空幻不切